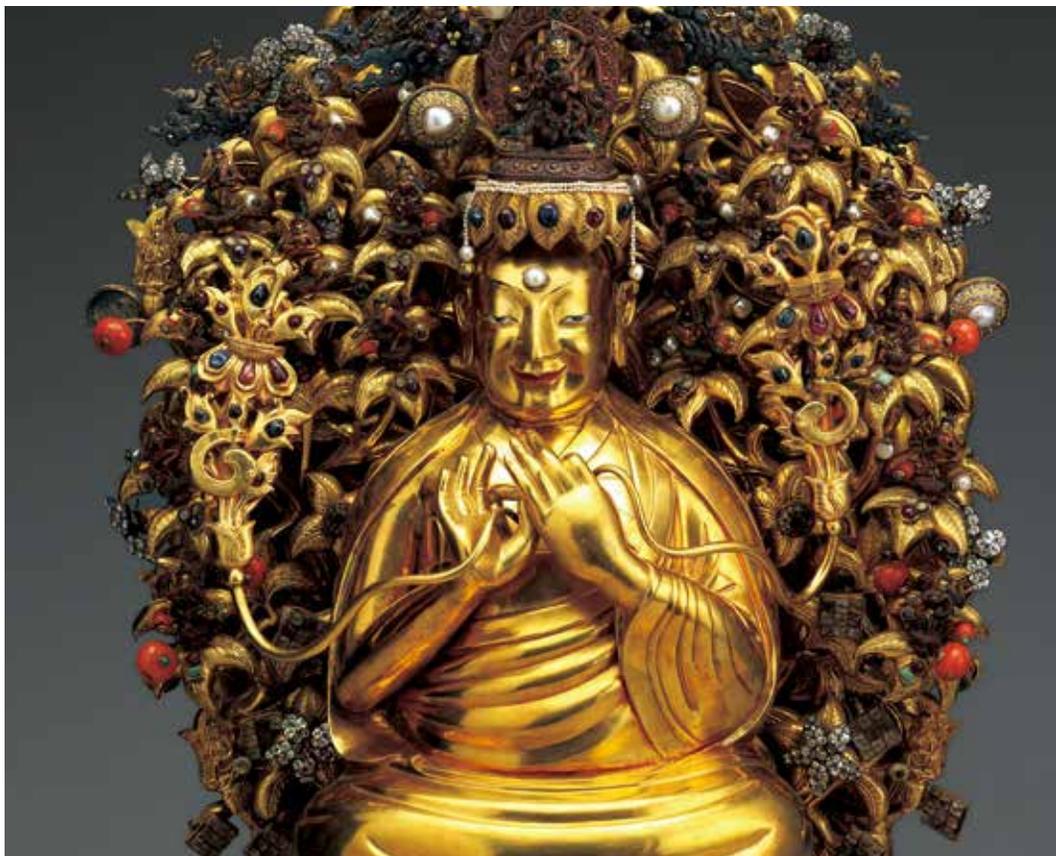


「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策展經緯

■ 劉國威

此次將先後於南院及北院舉行的特展——「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是頗獨特的策展規劃，不僅呈現清代的藏傳佛教文物，也透過古籍文獻，重點講述此時期的「活佛」體制及相關人物。「呼畢勒罕」乃清廷對「轉世活佛」的正式用語，乾隆皇帝譯為「轉世再來人」。十六世紀末，蒙古諸部陸續接受格魯派為其主要佛教信仰，將藏語「化身」一詞譯為蒙語「呼畢勒罕」。滿族入關前，受蒙古族影響而接觸藏傳佛教，入關後更進一步扶植格魯派成為滿、蒙、藏三族的共同信仰。本展將展出多項未曾公開展示的珍貴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加上國內典藏單位的造像與圖像，以及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的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相關文物，在質與量上實頗可觀。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紀起向亞洲各地傳播，於一世紀初傳至中原漢地，位處高原的西藏民族則遲至七世紀始與之接觸。西藏佛教雖大部承襲印度後期大乘佛教特色，亦吸收相當程度的漢傳佛教內容，再融入當地原始宗教習俗，而發展成為今日的獨特信仰體系。

藏傳佛教各宗派皆形成「轉世化身」的傳承世系，漢人俗稱為「活佛」。佛教雖承認輪迴轉世之說，但類似西藏此類的認證習俗未曾於印度或中國形成，而且此制度在西藏也是漸進發展而來。七至九世紀的「前弘期」佛教與十世紀末復興的「後弘期」佛教，藏區佛寺的領導承繼皆採師徒或家族制。十三世紀，噶瑪噶舉派為決定教派領袖，首先採用轉世制度。至十五世紀末，活佛體制漸為各派採納，迄今仍係藏傳佛教領袖的主要傳承方式。

滿清自太宗皇太極於1635年擊敗林丹汗後，即受鄰近蒙古部族的影響而開始接觸藏傳佛教；入關後，與青海蒙古和碩特部所支持新建的格魯派政權更積極往來，並刻意扶植該派，這不僅單是欲藉其影響力形成對蒙藏地區的攝受，在其支持格魯派的過程中，清廷也的確逐步接納此宗派傳承為其信仰。由於清代格魯派的特殊政教地位，該派在藏蒙及其周邊地區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宗派。清帝在內廷也毫不避諱地展現其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因此在院藏中可見頗為豐富的清宮藏傳佛教文物。

本院過往曾舉辦數次與藏傳佛教相關的特展，但多著重於文物本身的藝術與文化特質，如2016年的「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2011年的「龍藏——院藏大藏經展」、2010年的「聖地西藏——最接近

天空的寶藏」、1999年的「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等，較未著重呈現藏傳佛教的歷史背景。國外博物館所舉辦與藏傳佛教主題相關展覽，也多半側重宗教藝術層面，如金銅造像或唐卡繪畫等。

此次將於南院及北院舉行的特展——「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可說是一頗獨特的策展規劃，不僅呈現清代的藏傳佛教文物，也透過古籍文獻，重點講述此時期的「活佛」體制及相關人物。特展原獲得蒙古共和國博格達汗博物館（Bogd Khan Palace Museum）允諾借展百餘件該館典藏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相關文物，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蒙古文物可惜無法來台展出，經本院策展同仁費心討論加以調整，將展出多項原未列入規劃且從未公開展示的珍貴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加上國內典藏單位（卡廬文化、雙親文教基金會、揭諦樓）借展的造像與圖像，以及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的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Janggya hotogtu）相關文物，本展在質與量上實頗可觀。

本展標題涵義

展覽主標題「呼畢勒罕」對多數人而言是一陌生語彙，但特意採用此詞實有其用意：第一，此詞為蒙語 *Khubilghan* 的音譯，亦為滿語轉用；本是大乘佛教專有名詞「化身」（*Nirmāṇakāya*）的蒙語翻譯，意指佛菩薩為渡化眾生所化現的種種身相，後用於指稱藏傳高僧的轉世化身，乾隆皇帝（1711-1799）多次將此詞漢譯為「轉世化生人」（如〈御製喇嘛說〉，圖1）。第二，「呼畢（必）勒罕」也是清廷對「轉世活佛」的正式用語，清代官方文獻從未使用「活佛」一詞，更遑論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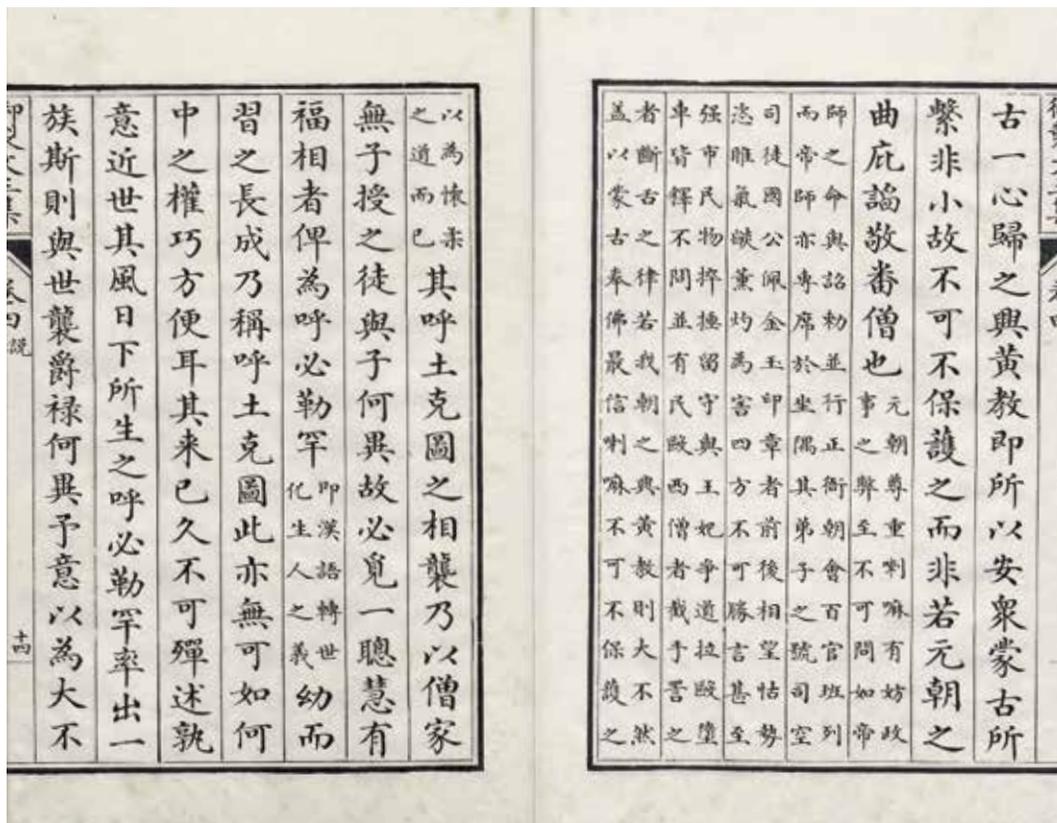


圖1 清 乾隆58年(1793) 〈御製喇嘛說〉 收於清嘉慶間內府烏絲欄寫本《御製文三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7854

代習稱的所謂「靈童」。本展標題透過此特殊詞彙，所要傳達的歷史意涵是：清代的滿人並非直接從西藏民族那裡學習到藏傳佛教，而是透過蒙古人的信仰文化。本特展的清代檔案即可見其例，當述及某位活佛的轉世化身時，如達賴喇嘛，必稱「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本展文物中常見的另一相關詞彙亦可為佐證：清代官方冊封蒙藏地區轉世活佛的最高頭銜——「呼圖克圖」，此詞亦為蒙語 *Khutuktu* 的音譯，原意為「有福者」，後指「聖人」，自明末青海蒙古和碩特部領袖俺答汗首度贈銜「滿珠錫理呼圖克圖」予格魯派高僧東科爾後，逐漸成為蒙古人對高地位活佛的尊稱，再為清廷所引用。

清政府所支持的格魯派 (Gelug) 由高僧宗喀巴 (1357-1419) 所創，他於 1409 年在拉薩近郊的半山上興建甘丹寺，被視為該派創立的標誌，因此初期被稱為「甘丹山派」。此派是藏傳佛教最後成立的教派，「格魯」為藏語音譯詞，意為「善規」，是該派興盛後的名稱；由於宗喀巴重視持戒，仿往昔噶當派祖師頂戴黃色尖頂僧帽，作為嚴持戒律之象徵，後該派僧人在法會中習戴此型僧帽，故又別名「黃帽派」，傳至漢地亦譯為「黃衣派」，清代官方文獻則一律稱其為「黃教」。

十六世紀末，蒙古諸部陸續接受格魯派為主要佛教信仰，將藏語「化身」（發音為 *Tulku*）一詞譯為蒙語「呼畢勒罕」。滿族入

關前，受蒙古族影響而接觸藏傳佛教，入關後更進一步扶植格魯派成為滿、蒙、藏三族的共同信仰。對於呼畢勒罕的承續，清廷建立一套完整的官方認證體制，透過冊封與納貢，委由格魯派高僧參與掌理蒙藏地區政教事務。

自順治皇帝（1638-1661）以來，清廷對藏蒙地區格魯派其中四位轉世「活佛」最為重視，給予特殊的冊封頭銜與待遇，這四位活佛在藏傳佛教文化圈至今仍存的重要宗教地位確實源自清廷的刻意扶植。他們的封號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的〈喇嘛封號〉章節記載甚詳：順治十年（1653）第五世達賴喇嘛來朝，賜以金冊金印，授為「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但喇達賴喇嘛」；康熙三十二年（1693）冊封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大喇嘛」及「庫倫廣演黃教」；康熙四十四年（1705）冊封二世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康熙五十二年（1713）冊封第五世班禪呼圖克圖為「額爾德尼」。

本展以清代與格魯派活佛相關的文物作為佈陳內容，一方面介紹清廷與這四位格魯派重要活佛間的互動歷史，另一方面引介清宮的藏傳佛教藝術特色。

從明代「活佛」到清宮的格魯派

第一單元「清宮與活佛」中，以說明漢文「活佛」一詞的淵源為始，繼而透過文物呈現清初諸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對藏傳佛教的作為及所曾往來活佛的評介態度，第三部分則以相關文物介紹格魯派的傳承發展與宗派特色。其中代表性重要展件有：

一、〈長安宮女行〉：「活佛」一詞最

早見於元代漢文佛教文獻，意指「在世的佛」；此詞用於指稱藏傳佛教轉世僧人，最早則見於《韓五泉詩》中〈長安宮女行〉：「更寵番僧取活佛，似欲清淨超西天。」作者韓邦靖（1488-1523）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進士，因觸怒武宗，被下詔獄，後削職為民。此詩句是對明武宗的諷刺，由於武宗親近藏傳佛教，宮內常延藏僧大作法事，甚且自封「大慶法王」，故儒士頗有批評。最早的明萬曆本《韓五泉詩》恰為本院典藏，因此特予展出以為佐證。

二、〈宗喀巴金像〉（圖2）：據背光背面銘文，本件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六世班禪所進獻的西藏作品為型，照式範金鑄成。宗喀巴雙手胸前成說法印，手中各拈一莖蓮花；花頂左側托經，右側托劍，皆象徵智慧，亦說明格魯派創教祖師厥為文殊菩薩化身。

三、〈御製喇嘛說〉（烏絲欄寫本《御製文三集》）：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清軍擊退入侵後藏的廓爾喀軍後，乾隆指示大將軍福康安籌議善後及改革西藏政制之章程事宜，匯總頒布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其中第一條即明訂以「金瓶掣籤」擇定呼畢勒罕的制度。¹次年四月頒布〈御製喇嘛說〉。此文以滿、漢、蒙、藏四體文字勒石立碑於雍和宮「御碑亭」內，亦載於《清實錄》、《乾隆御製文集》、及《衛藏通志》等史書。內容分三重點：1. 解釋「喇嘛」及其發展簡史。2. 闡明「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之重要性。3. 說明認證活佛轉世的弊端，提出「金瓶掣籤」的改革辦法。最後強調訂此新制可「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

四、〈文殊軸畫〉（圖3）：乾隆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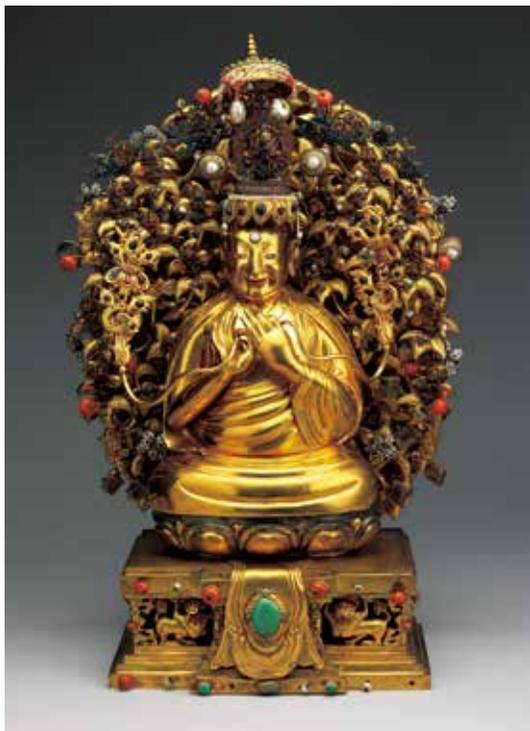


圖2 | 清 乾隆46年 宗喀巴金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雜000088



圖3 | 清 乾隆26年 文殊軸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710

年（1761），高宗巡幸五臺山，瞻禮文殊菩薩聖像，並以水墨摹寫，後命善畫之丁觀鵬設色，費時七月始成。乾隆皇帝嘗以文殊菩薩在世化身自詡，親自摹繪成圖，顯見他對文殊菩薩的宗教情感深厚。

五、〈白檀木顯字枝葉〉（圖4）：西寧塔爾寺為紀念格魯派始祖宗喀巴（1357-1419）出生地所建寺院，乾隆十四年（1749）清高宗親筆御賜「梵教法幢」匾額與「梵宗寺」寺名予塔爾寺。此「白檀木顯字枝葉」係收貯於一長方形漆盒內，以五份黃紙包分別包裹數片褐色乾葉、兩枝枝葉與樹皮，黃紙包墨書藏文唵、巴、打、吽、惹（om, pa, da, hūm, ra）等字，盒蓋內白色織品上墨書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漢文曰：「乾隆十四年章嘉胡土克圖欽奉上諭，自阿穆多地方梵宗寺恭請大聖宗喀巴降生時，割臍滴血處自然生成、有番唵等字樣大利益白檀香樹皮花葉。」此白檀樹據悉至今仍存活於塔爾寺。



圖4 | 清 乾隆14年 白檀木顯字枝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60~000566

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

第二單元是「西藏的達賴與班禪」。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Gedun Drupa, 1391-1474）與克主傑（Kedrup Je, 1385-1438）分別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與第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係西藏最重要的兩支格魯派活佛世

系。「達賴」為蒙語，意指大海，乃蒙古土默特（Tumed）部領袖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贈予第三世達賴的頭銜。有清一代，達賴世系的傳承為第五世至第十三世。「班禪」為「大班智達（Great Pandita）」之意，「班智達」係梵文 Paṇḍita 的音譯，表示



圖5 16世紀 三位達賴喇嘛曾執金剛鈴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712

智者，乃蒙古和碩特（Khoshut）部領袖固始汗（Güshi Khan, 1582-1654）贈予第四世羅桑秋吉嘉參（Losang Chö kyi Gyaltzen, 1570-1659）的尊稱；「額爾德尼（Erdeni）」則是梵文 Ratna（珍寶）的蒙語音譯。班禪額爾德尼於清代的轉世世系，由第四世至第九世。本單元除以圖像介紹達賴與班禪世系的重要轉世上師外，亦展出五世達賴與六世班禪赴京面見清帝的重要歷史文物，說明清廷以「金瓶掣籤」制擇定呼畢勒罕對西藏活佛世系的影響。其中代表性重要展件有：

一、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此壇城以綠松石代表須彌山、四大部洲、七金山、日、月等，周繞以珊瑚串，乃順治年間五世達賴供養於西黃寺，章嘉呼圖克圖又請入內廷供養者。全器金屬作工之繁密，乃至珊瑚、松綠石的質材，均屬上乘。

二、三位達賴喇嘛曾執金剛鈴杵（圖5）：鈴杵盛裝於皮盒內，盒內蓋上皆有墨書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漢文為：「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筭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筭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瑪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札嘛嚕手鼓）。」意指此法器曾由二世、三世、五世達賴喇嘛所使用。末句漢譯有誤，應為：「乃具加持之再造噶瑪漢鈴。」「噶瑪漢鈴」指明代皇帝賜贈噶瑪巴而傳入藏區的鈴杵，其特徵是鈴面八蓮瓣上分別有八梵文種子字，藏區的「再造」則是將梵文改鑄為藏文字體。

三、六世班禪進獻嘎巴拉數珠（圖6）：據匣內題記，此串數珠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二十七日在寧壽宮念經時所呈進。三天後，他病逝北京。

四、六世班禪進獻《丹書克》（祝壽文，



圖6 | 清 乾隆45年 六世班禪進獻嘎巴拉數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79

圖7)：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1738-1780)應乾隆皇帝邀請赴北京出席其七十歲壽誕祝賀活動，此份《丹書克》(祝壽文)為該年八月二十日寫於熱河的須彌福壽之廟，內容是對乾隆皇帝過往十一世轉世的祈請，其中囊括：釋迦牟尼佛時的波斯匿王、吐蕃王朝時的藏王牟尼贊普(756-799)、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乾隆皇帝的前一世則是格魯派第四十六任的甘丹赤巴境巴嘉措(1629-1695)，六世班禪自述這是他見到乾隆皇帝時內心所感。

章嘉國師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三單元是「安多章嘉(國師)與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國師為清代漠南(內蒙)、安多(甘青藏區)與北京地區位階最高的格魯派活佛，頭銜源自康熙欽賜之「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章嘉」之名有二說法：一說因其出生於白樺樹生長之地，藏語白樺樹的音譯近似「張家」；另一說則是其第一世為張姓漢人之子，故名「張家」；康熙皇帝以「張家」二字不雅，改為「章嘉」。其清代轉世世系為第二世至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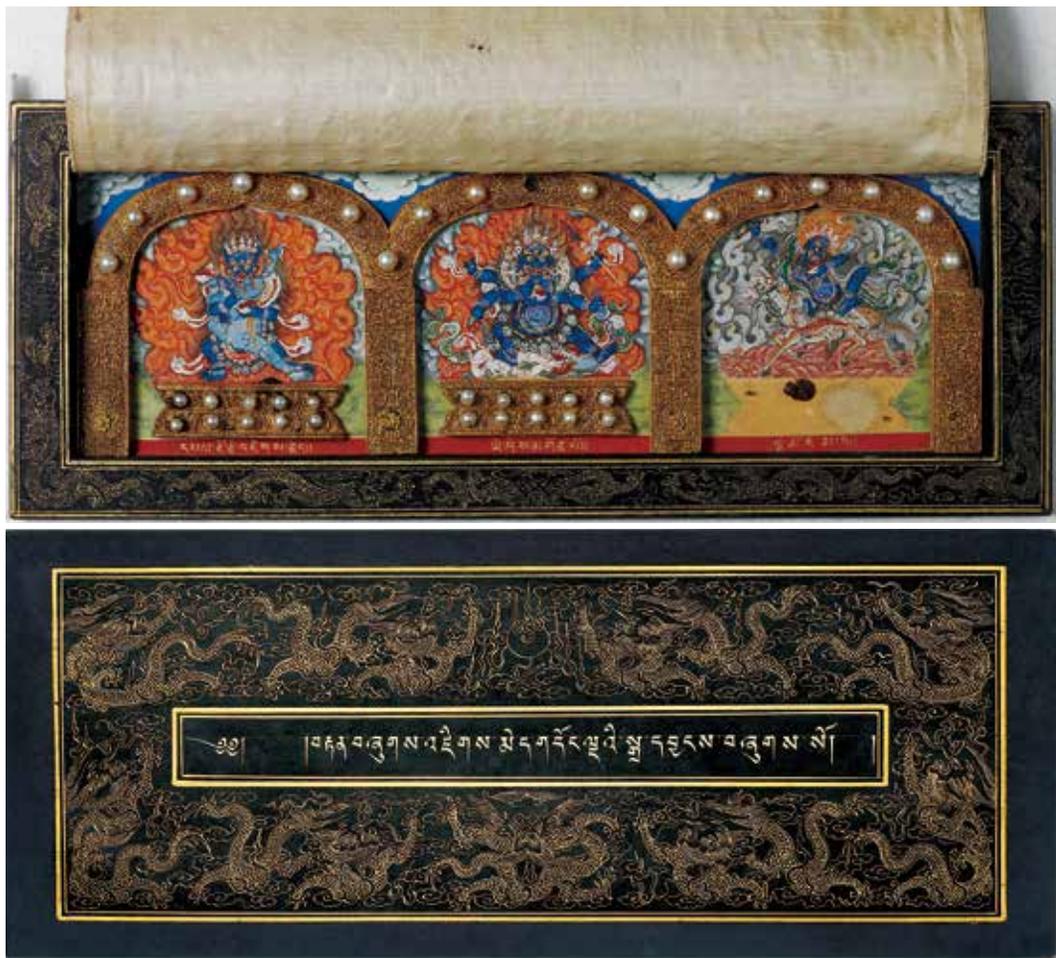


圖7 清 乾隆45年 六世班禪進獻《丹書克》(祝壽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佛00001、00002

世，傳承中最著名者，即乾隆朝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與其相關的文物本院典藏頗豐；晚年隨政府抵臺的第七世章嘉（1890-1957），臺灣習稱「章嘉大師」，其生前器用與信笺手稿由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典守，此次係首度對外公開展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清代外蒙喀爾喀部地位最高的格魯派活佛，轉世世系為第一世至第八世。第一世羅桑丹貝嘉參（1635-1723）入藏學習時，曾獲五世達賴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號，「哲布尊丹巴」為藏文音譯，意為「聖尊」，繼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聖祖冊封為漠北（外蒙）黃教教主。哲布尊

丹巴世系中最具影響力者，為康熙朝的第一世與清末的第八世，本單元著重展出院藏相關文獻。其中代表性重要展件有：

一、《清文全藏經》：按其滿文標題，《滿文大藏經》應譯為《滿文翻譯大甘珠爾經》。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以蒙、藏、漢文《大藏經》皆已刊行，獨闕滿文，遂請三世章嘉呼圖克圖（1716-1786）主持滿文譯經，主要參照漢文藏經，比對蒙文《甘珠爾》後繙譯，內容以經、律為主，密續經典收錄較少。此項譯經事業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共譯經典七二九部，其中十三部譯自藏文《甘珠爾》，餘七一六部皆譯自漢文，

版本則依乾隆三年雕造完成的漢文《龍藏》。全藏共一〇八函，採雙面朱印，初刷十二套，現僅存兩套：一套存拉薩布達拉宮的三界殿，另一套則分藏兩岸故宮：本院藏三十二函，北京故宮典藏七十六函。

二、清高宗《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冊（圖8）：《法身禮》本是唐代流行的禮懺文，早先通行的十首偈頌出自北魏景明二年（501）曇摩流支（Dharmaruci）所譯的《入佛境界經》，唐代不空（705-774）依梵文本增補重譯為此四十一頌的《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此作由乾隆皇帝親抄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季夏月朔日（六月初一），地點是熱河殊像寺，²北京故宮亦存一部乾隆於該年稍早（仲春月）抄寫的同部經典，以及另一部以漢、滿、蒙、藏四體抄寫的泥金寫本。此作跋文記載此經是章嘉國師自大藏經中特別檢出，顯示乾隆對此部經典的重視實來自第三世章嘉的影響。

三、《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冊文》（圖9）：民國三十六年（1947）四月，

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獲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後，政府授予其「護國淨覺輔教大師」名號，並頒授冊文印信。「章嘉大師」名號亦由此而始。

四、皇太子胤祜奏摺「奏聞賜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人參藥品」：康熙二十七年（1688），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部，第一世哲布尊丹巴（1st Jezundampa, 1635-1723）的額爾德尼召寺（Erdene Zuu Monastery，漢名光顯寺）遭毀，他率其他喀爾喀部貴族一同歸順大清。康熙三十年（1691）冬，哲布尊丹巴應康熙皇帝之邀往訪北京，一直住到康熙平定準噶爾部後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方返故地重建原寺。此滿文摺件日期為康熙三十六年初，當時康熙正於熱河御駕親征準噶爾部，內容前半部是太子胤祜從北京向康熙的呈報，後半部是康熙向太子述說其所處前線景況。呈報大意：「哲布尊丹巴遣使來訪，說明御旨曾言若呼圖克圖缺乏藥物，可差人到內索取。現呼圖克圖那裡缺少人參，且其佛像畫工前陣子遭癩人刺傷，傷處仍未收口，故前來索取此二種藥物。我這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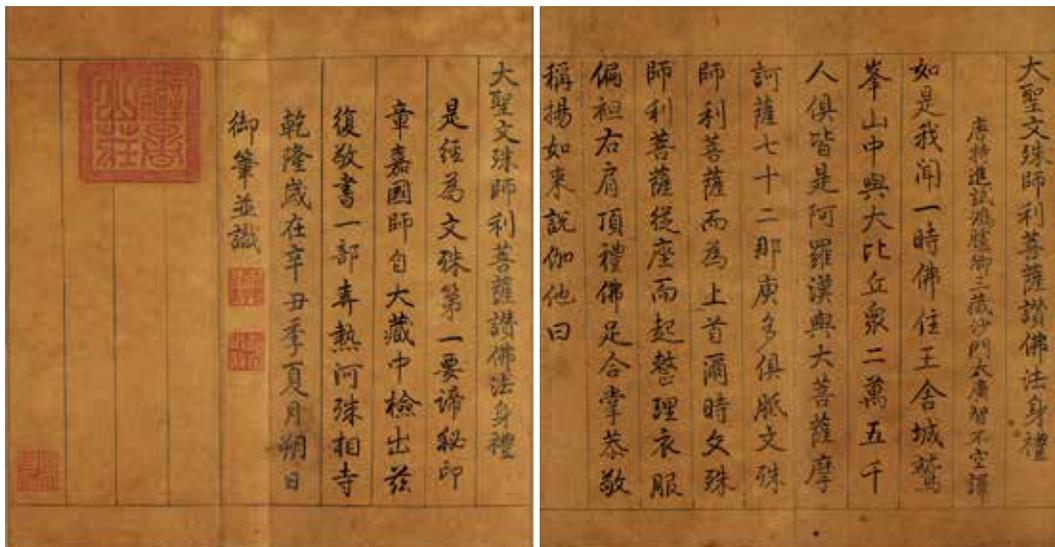


圖8 | 清 乾隆46年 清高宗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書000060



圖9 | 1947 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冊文 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藏 CK0100100002

父皇之前賜予的三七，故予其十四兩；另有西洋治傷油膏，已將療法譯為蒙文，足量給予；一等二等參，各予其一斤。」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以其藝術才能而知名，蒙人習稱「Zanabazar 風格」的造像即由其所創制，當時他在北京曾為清宮佛殿製作多尊佛像。

走近活佛的生活

第四單元是「走近活佛的生活」：格魯派活佛世系多於清代形成，不僅見於藏族地區，更遍及內外蒙古，即使北京亦有所謂「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不同地區的活佛角色呈現相當多元的樣貌，對其駐錫所在的影响力亦不盡相同。受正式冊封的重要活佛不僅是宗教導師，對地區內的政經發展尤具影響力，因而成為政教領袖。本單元將以各類相關文物展示清代活佛在個人修持、公務往來、儀式法器等领域的面貌，而清宮內廷供奉的藏傳佛教文物，更將使觀眾得見活佛對清室宗教信仰的深刻影響，本單元將展出養心殿、毓慶宮、慈寧宮、避暑山莊的供品與造像，不少展件是首次公開展出。其中代表性展件有：

一、章嘉大師親撰蒙古政教欣榮祈願文：跋文記載此文成於鐵兔年（1951）正月初一，地點為「臺灣島臺北市的圓滿寶洲」（即其住處）。接續此文後頁的內容是章嘉大師所撰甘珠爾瓦呼圖克圖（1914-1978）偈頌體簡

傳，由於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是內蒙活佛，此祈願文應是為他所寫。

二、象牙瓔珞冠與象牙瓔珞衣：象牙及動物骨骼雕製成的鬘鬘五佛冠和瓔珞裙，是蒙、藏族年節法會時演舞喇嘛穿戴的服飾配件。冠上飾代表五方佛的梵文字母，腰間飾法輪、金剛杵，墜飾寶石、垂鈴，細緻華麗，為宮廷作坊製品，原貯藏於皇帝居住的養心殿。

三、銅鍍金佛塔及《五福德經》（圖10）：嵌玉木座的龕內置《五福德經》玉冊，座上供奉銅鑲金藏式佛塔，覆鉢下作三道圓階的尊勝塔，塔龕內亦彩繪尊勝佛母，塔座陰刻大象等動物，塔底刻十字金剛杵，刻線流暢，塔型圓渾，比例均衡，是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作坊的佳作。

四、中正殿送白傘蓋大迴避巴陵禮節事（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在中正殿設立掌管宮中藏傳佛教事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每年定期在中正殿各佛堂舉辦佛事活動。依此檔內容可知，每年十二月初九，中正殿舉辦遣送「白傘蓋大迴避巴陵」（梵文 Balin 的音譯詞，即食子供品）的除障法會，皇帝依制須親至中正殿壇城前拈香，向駐京各呼圖克圖供茶並發放佈施。本次特展也順此清宮典故，將邀在臺藏僧於展廳現場繪作一白傘蓋砂壇城，於展期間公開展示。



圖 10 | 清 銅鍍金佛塔及《五福德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2012

小結

綜觀有清一代，面對複雜的蒙藏政教情勢，清廷對藏傳佛教文化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活佛」，逐漸形成一套嚴謹的制度規範，乾隆晚年制定的「金瓶掣籤」，對活佛認證的體制的確有重大影響，但主要是規定理藩院造冊登記在案的呼圖克圖位階活佛須經此制認證，且因清廷扶植的是格魯派黃教，受封呼圖克圖頭銜者多屬此派，其他派別或非屬高位的活佛認證不須呈報，也不受限於此制。此外，呼圖克圖位階以上的格魯派活佛同時也受年班朝貢制的規定，如《欽定大清會典》中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間年輪班遣使進貢」，³不在所列名單上的活佛按

清制不可隨意遣使進貢。因此，本展文物中有一部分即是此制度下來自藏區高層活佛的貢品；但也有許多供具或法器，雖屬藏傳佛教文物，卻是宮內造辦處的作品，其漢藏混合風格、特殊材質（如琺瑯、玻璃、玉等）、乃至工藝技巧都與蒙藏同類文物的製作傳統有別。總結而言，此次「清代活佛文物大展」中，院藏文物的獨特歷史背景就是它們代表了清宮與蒙藏上層格魯派活佛間的往來歷程，有其特殊性，並非藏區的藏傳寺院文物，帶有獨特清室皇家特色，傳達出清代內廷受藏傳佛教影響下的信仰內涵，頗值細心賞析。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為防蒙藏貴族勾結吹忠降神操控活佛轉世認證之弊端，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其第一條規定：在北京雍和宮及拉薩大昭寺分設二金瓶，蒙藏地區呼圖克圖位階活佛，其呼畢勒罕候選童子，須將其名字與生日書於象牙籤上，置於瓶中，由理藩院尚書或駐藏大臣監督，當眾掣籤公佈。
2. 此寺為乾隆命內務府仿五台山殊像寺興建於避暑山莊北面，為承德外八廟之一。
3. 即每兩年進貢一次。章嘉因長期駐京，不必受限此制；哲布尊丹巴則是規定重要節慶進貢。